

文艺观察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70年前的这场战争,既是一场保家卫国的反侵略之战,也是一场以弱胜强的非对称之战。在这场战争中,魏巍、陆柱国、巴金等著名作家都到了前线,创作出《谁是最可爱的人》《上甘岭》《团圆》等真实反映这场战争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承载和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激励和抚慰了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也极大地调动并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很多作品后来更是成为经久流传的红色经典,对新中国文学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70年来,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也时时牵动着后辈作家们的目光,不断有新的作品涌现。

简要梳理,不难发现,随着历史语境和文学潮流的更新、嬗变,不同阶段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在观念、主题、文体、形式、内容等方面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始终不曾中断;不同年代的作家对这场战争的接续书写,最终汇聚成记录英雄壮举、鼓舞时代精神的文学强音。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初期,继承了解放前的革命文艺传统,它首先是一场主题性、组织化的文学创作运动。战争爆发之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就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运用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为保卫和平、粉碎战争贩子的阴谋而斗争”,仅1950年6月至1953年10月,就先后派出三批战地作家记者团奔赴前线采访。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在195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产生了极为广泛而热烈的社会反响,“最可爱的人”也成为志愿军官兵的代名词。同样登上《人民日报》头版的战地诗歌《打败美帝野心狼!》后来被谱写成曲,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巴金曾前后两次赴朝,传回了《一个英雄连队的生活》《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等34篇战地通讯。陆柱国的《上甘岭》和巴金的《团圆》等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等,影响巨大。

从1950年10月出兵至1958年10月部队全部撤回,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相应形成了三次高潮。可以说,在物质匮乏、保障艰难的情势下,经由组织化的生产传播机制,抗美援朝战争文学创作弘扬了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最大程度地凝聚起了中华民族的磅礴力量。魏巍后来回忆时谈及,《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作品表现出的“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激扬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任何敌人也压不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1950年代刚刚从几十年战争中解放出来的人们所拥有的、也是那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

一般而言,小说创作往往需要与事件拉开一定时间距离,需要通过想象、虚构的文学形象来表达。因此,这一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小说在数量和质量上形成较大落差。一方面,创作热情高涨,仅1950年代就出版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18部,短篇集10部;1960至1970年代有长篇小说5部,短篇集8部,题材亦很广泛,包括铁路工人参加抗美援朝战斗(杨朔《三千里江山》)、志愿军空军英勇作战(魏巍、白艾的《长空怒风》)等内容。另一方面,小说的艺术质量却并未达到理想的水准。有的小说中,英雄人物形象单薄、性格单一,结构布局不尽合理,精细描写略显不足,存在一定的模式化与概念化问题。这些现象在当时就被批评为“不能真正地、深刻地理解生活与人物”。整体而言,组织化、一体化的抗美援朝题材文学创作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文学资源,有效且有力地完成了对于家国主题、崇高意识、爱国精神的叙事和表达。

需要特别论及的是魏巍的《东方》与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两位作家都亲历过抗美援朝战争,这两部长篇小说也都是新时期文学结出的硕果。魏巍的小说把众多英雄人物的共性与个性、战争的进程及前后方联系、战争本身的意义及军事与政治工作上的经验等内容全都表现出来,以“激发人们的革命斗争性,发扬革命精神”“为将来的反侵略战争作准备”。长达80余万字的《东方》双线并进,将前线战役与后方建设连缀铺开;既写英雄人物杨雪、徐芳和郭祥等人的模范事迹,也写他们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既写陆希荣与李能从战斗英雄和土改功臣蜕化为敌对分子的曲折历程,也写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关系等问题;对人物情感关系微妙细腻的描绘,体现出对于美好爱情的追求,使得人物更加立体丰满;既彰显出无产阶级的崇高道德观念,也更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展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生观和美学品质。《东方》于1978年出版,1982年获得茅盾文学奖。

丁玲读完《东方》之后,认为小说写出了“一个时代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要

鼓荡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回眸

■高静

想真正了解那段历史,还要看《东方》”。从魏巍的创作历程看,可以说,他始终坚持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文学传统,坚持描写生活与人性的复杂,将革命英雄主义作为时代精神与民族品格进行浓墨重彩的深描,深刻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塑造出了典型而立体的英雄形象。

孟伟哉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写作路径亦大体如此。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内容广度与让革命英雄从典型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人物塑造方法。《昨天的战争》以团长周天雷的活动来结构小说,以进行时态描写战争历程。小说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中,为众多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营造了真实的环境,也使得小说获得深厚的历史纵深感。周天雷这个人物凝结了作家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情感和想象,抒写了浓重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孟伟哉此后还写作了数篇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短篇小说,如《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头发》《战俘》《被俘者》等。《一座雕像的诞生》对革命者的道德观念和人性的美好进行了富于激情且精准细腻的描述。可以说,孟伟哉的创作在塑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英雄形象的同时,也提升了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的美学品格。

新时期以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融入战争文学的广阔主题和视野,受到“人”的文学思潮影响,表现重点也由集体主义的、大写的“人”变为更加人性化的“个人”,创作主体普遍更加关注战争境遇下人物的命运遭际、情感状态和心灵世界。有的小说采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讲述父辈的故事,通过“父”与“子”的对话,将战争与人的命运关系引向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对人的命运给予更深层次的观照。

进入1990年代后期及至21世纪,一批怀揣使命感、责任心的军旅作家基于对更多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资料的

掌握和对志愿军老兵的采访,重新燃起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激情。从传统的报告文学到新崛起的非虚构写作,从中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创作,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渐趋活跃。1999年,王树增创作出版了长达60万字的长篇非虚构文学《远东:朝鲜战争》。王树增渴望通过对那些个体生命的细腻书写,找到他们在极端条件下创造这场无与伦比的战争奇迹的秘密,找到中华民族于这场战争中展现出的信仰与精神力量,进而呈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志与心灵史。

进入2010年代,王筠相继推出两部,共计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长津湖》(2011年)与《交响乐》(2019年)。《长津湖》聚焦于抗美援朝战史上最为惨烈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交响乐》则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志愿军是如何在超出人类极限的极端恶劣环境中创造奇迹的?这一问题成为这类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叙事作品的主线,笔者将其称为抗美援朝战争题材文学创作的“再主题化”。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二元对立的阶级叙事与革命英雄主义赞歌以外,开辟了从文化冲突视角诠释和平价值与人性升华的新鲜视域。这种拓展使得《长津湖》与《交响乐》具有了超越性的文学向度,显示出与以往同类作品的显著差异。在《交响乐》中,马永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保持德不孤必有邻的道德信条,感化了美军的纽曼上尉。

王筠在塑造人物时总是让他们陪着读者走,读者仿佛距离接近人物、零距离贴近战争,感受战争对人物命运的影响和改变。文化冲突视角的主题发掘同时也导向叙事形式的探索,《交响乐》以卡尔维诺“负时间”的倒叙开头,又以“负时间”讲述进入尾声,前后叙事的空间跨度大,仿佛交响乐章中的第一部分“呈示部”与第三部分“再现部”。当中的空间纬度叙事,则是第二部分的“展开部”。形式与主题对应,《交响乐》以气势恢宏的笔调,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直击心灵的悲壮赞歌。王筠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因而表现出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自觉坚守对战争历史的崇高敬意与军旅小说的美学追求,西元近年来连续创作了三篇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小说——《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死亡重奏》与《无名之地》。《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以指导员王大心带领几个战士受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小站搬运水泥为小说前景,以王大心从废旧杂志上看到1950年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冬天,整整一个连的志愿军战士为伏击美军,竟全部冻死在阵地上无一生还的故事作为小说背景,表现了军人不怕牺牲、坚韧顽强、不慕名利的英雄精神。西元是带着极为浓烈的情感来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他渴望依靠精神性的书写抵达未曾经历过的悲壮时刻,与先烈对话。在《死亡重奏》中,西元运用回忆、对话等方式从不同侧面描绘了人物的前史,普通士兵上官富贵、王尽美等人经历过的巨大伤痛,苦难与百年旧中国的命运勾连在一起,河南、安徽、东北等地理风俗在人物的记忆和感受中被富有质感的文学语言细腻复现。严肃的精神对话,剧烈的情感撞击,使得《死亡重奏》形成一种独具特质的战争美学风格。这篇小说借用西方音乐形式,细腻、详尽而严谨地描写了各种死亡情景和残酷战斗,诗化地铺展开人物牺牲的壮烈,由此形成一首动人心魄的“死亡重奏”。这源自作者对战争美学的独特思考。对于西元来说,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对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致敬。因此可以说,西元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是一位军旅作家对英雄主义精神内核与崇高战争美学严肃而深沉的当代书写。

作为一场战争,它已远去;作为文学题材,它则历久弥新。从规定主题的集团化冲锋,到20世纪80年代的“背景化”写作,再到21世纪初年的“再主题化”叙事,70年来的抗美援朝战争题材小说创作,因应着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发展逻辑,表达了深沉而又厚重的民族情感,抒写了高蹈且深邃的战争史诗,鼓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时代强音。

文艺评论

长征

第4999期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王昆的长篇小说《天边的莫云》(《中国作家》文学版2020年11期)是一部反映军队援藏工作的文学作品。一支医疗设备先进、诊疗技术高超的医疗小分队,进入海拔5000米左右的雪域高原牧区,与那里的牧民们展开了一场心灵与信仰上的碰撞,从而发生了一系列或意料之外或情理之中的故事。

在《天边的莫云》中,文学冲突一直暗含在故事讲述当中:现代医学与传统藏医的冲突;传统思想和新颖观念的冲突;东方玉音和格桑拉姆之间的冲突……在作者的笔下,这些隐若暗礁的矛盾最终都被一种暖融融的气氛化解开了。

作者娓娓道来地告诉读者,在草场上,在格吉部落生活的地方,没有对错,只有各种生命相互和解。次仁央宗救助受伤的小牛,精心为牧民看病的洛扎曼巴,格云社区里的流浪藏狗,民工老郭种下的每一棵树,人或动物,都那么迷人。而东方玉音对高原牧区的那片深情,她对草场人或动物的理解与尊重,珍贵且具有鼓舞作用。

故事的开始,东方玉音带领一支医疗小分队深入牧区开展义诊,走过辽阔无际的草原,走过根桑台、走过风雪、走进阳光,走进黑牦牛帐篷,挨家挨户地诊疗、服务。王昆对医疗队在藏区的日常生活描写得细致入微,在文字之间保留了这片草场本来的模样。

因热爱而迷人

——评王昆长篇小说《天边的莫云》

■才吉卓玛

4年来,作者多次深入高原牧区,有了太多刻骨铭心的经历。他选择冷静地看待这些事实,并完成了自我的内心和解。内心的和解,需要在生命体验基础上达成对万物存在、和谐共生的认识与理解。作者由此深刻认识到了这片草场真正的“美”,《天边的莫云》契合这片高原的特性,说出了“他们”该有的话语。在次仁央宗那里,“生死由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的时候光着身子,到山坡上的噶尔萨寺里,找丹增喇嘛取一个充满吉祥的名字就行了,到了死的时候如果能贡献死去的肉身,一刀刀割尽了让天上的秃鹫饱食一顿,这一生的轮回就算圆满完成了。”在丹增喇嘛那里,“人世间”的疾病与苦难几乎总是由缺乏信仰、没有敬畏造成的——不敬畏大山,不敬畏河流,不敬畏脚下的每一片草叶,不敬畏每一粒尘埃。在我看来,他们很多人都是被欲望推动着活下来……不择手段,迷失在婆婆世界。”这是属于藏民族的语言,也正是作者内心的话语。

小说中的格吉部落充满了积极的希望,但这些希望隐置于矛盾冲突中。在沙日塘草场广袤的牧区里,一边是纯正的佛教信仰,一边是威胁身体健康的疾病,在这些相对矛盾的因素中,作者需要做出权衡并表达出自己多层面的认知。在小说中,索朗央金斥责洛扎曼巴为生病孩子进行的射箭驱魔法事,认为必须通过科学的治疗才可以解决病情;同样受过教育的格桑拉姆则情感复杂,自己也无法决定内心的方向;而老一代牧民次仁央宗和洛扎曼巴则对草

场有着千年不变的虔诚情怀……对于这些隐匿的矛盾,作者以万物和谐的观点,认为一切都是平等的,自然而然,自然共生。无论出走还是坚守,都是基于大彻大悟的热爱。

《天边的莫云》对人物的塑造鲜活而生动。除了东方玉音和次仁央宗外,格桑拉姆的敏感、多疑、脆弱让人记忆深刻。她一方面接受了先进教育,另一方面又一直坚守草原的圣洁不可侵犯,在内心深处对闯入草原的不速之客有着天然般的排斥和不屑一顾。索朗央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她热爱自己的故乡,深爱自己的同胞,她积极向上,简单、豁达、干净、善良、悲悯,如草原上的阳光一样澄澈透亮。洛扎曼巴是草原上的赤脚医生,在整个莫云牧区有着很好的声誉,他全心为牧民和朝圣者提供服务。小说一开始对他展开了浓墨重彩的书写,但及至后部,这个人物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定位,至少是个性不足的。这也显露出作家在写作时的某种困惑与犹疑。

在雪域高原,牦牛是牧民们生存的重要依托。牦牛肉、牦牛奶,以及关于牦牛的各种话题,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用各种词语来界定一种熟悉的状态时,牧民们总会用“牦牛散步”作为形容,那是他们的词汇,也是属于高原的语言。而《天边的莫云》给了我这样一种阅读感受,那是一种基于热爱的熟悉、基于体察的和解。因热爱而迷人,王昆的小说充盈着包容、理解、尊重的情感,这也是《天边的莫云》叙事的力量所在。

“塬”上的文学风景

——读李伦长篇小说《青春的绿军装》

■李西岳

李伦的长篇小说《青春的绿军装》(花山文艺出版社),很像一张青春的老照片,颜色发旧,历久弥新。小说真实记录了一代军人的成长史、心灵史、命运史,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小说以主人公“我”为叙事视角,展开了一个战士的军旅生活画卷和心路历程。看似平淡的生活经历,却呈现了不平淡的军旅情结和人生况味。小说中的很多故事,今天看来算是“一地鸡毛”,但却是那一代军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写照。其中蕴含着理想的崇高、信仰的坚定、思想的纯洁、意志的果敢。那一代军人就是这样默默地奉献着青春,成就着事业,磨砺着人生。小说通过叙述这些看似“一地鸡毛”

故事,展开了对军旅生活、对人生命运的冷峻思考。

我觉得,这部小说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叙事平台——大西北的“塬”。这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苍茫、悲凉、凝重、雄浑、高远、神秘。塬上奇特的地貌、风光、气象、植被等等,使人自然会想起“醉卧沙场君莫笑,古人征战几人回”的边塞诗句。在这里,狼群攻击、人狼大战时有发生。而狼性与人性的对比,也在小说故事中生动呈现。比如,一头狼引导战士们救下身受重伤的花儿,为她找到家园。再比如,战士高志军把受伤的小狼狗抱回连队,群狼集结报复,当副连长想向小狼狗开枪时,他冒着危险向小狼狗扑去……这其中蕴

含着深厚的情感,也彰显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小说没有阐释这些复杂的价值观,但从这些故事本身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所在。

李伦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校期间,他就写过“塬”上系列中短篇小说。其中《最后的军旅》,写部队整编时军人与军马告别时撕心裂肺的情感流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就是说,30年前,李伦就已经在“塬”上作文章了,西北广袤大地的塬,成为他小说创作的根据地。李伦坚守着这块文学的阵地,也保持着自己的文学无用之地。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李伦在他心中的“塬”上重新创造出了令人感念的文学风景与生命价值。

播种文学的力量

■杨晓升

级别啊?”我知道,面对这样的询问,我得耗费一番口舌,才能给他们解释得清楚。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按照世俗的标准,我从原单位调到新的单位,自然应该是往高处走的;要么图级别高,要么图收入高。不然,就一定

是傻帽,就一定令人匪夷所思了……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君不见大红大紫的张艺谋,每部获奖并走红作品几乎都离不开小说的支撑;君不见新时期以来,一些大型文学杂志发行量一直居高不下;君不见近年来的图书市场,文学图书每年都红红火火唱着主角;君不见贾平凹、梁晓声、余秋雨、池莉等一批明星作家的作品一直在读者中走俏,而张平从《法撼汾西》《天网》《十面埋伏》到《抉择》,每一部作品所掀起的轰动效应,又何曾不续写着新时期文学洛阳纸贵的神话,何曾不体现着文学那永不衰败的艺术魅力?

所以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你选择之后怎么做。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

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

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你单位的高收入和高级别,也不在于你轻而易举地拥有荣华富贵,更不在于不劳而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优渥人生。最为重要的,在于你在生命过程中能身心愉快地劳动、付出与创造。

当你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最大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

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最高级别的人生么?

《人生的级别》这本集子所收集的篇什,总计约25万字,分印记、沉思、瞭望、观潮、谈艺五个部分。无论是书名还是分类标题,一目了然,它记录着我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三十多年来的人生履痕,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汇集着我三十多年来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凝聚着我对现实、社会、历史、人生、文学、艺术与人间世相的观察与思考,是我数十年来人生、思想与情感的珍贵结晶。